

ZHONGGUO JINJI MO SHI LUN

中国经济模式论

中国★模式★中国★模式★中国★模式★中国★模式★中国

• 王琢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中国经济模式论

◆ 王 琢著
◆ 湖南人民出版社

中国经济模式论

王 琛著

责任编辑：吴辛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望城县湘江印刷厂印刷

*

1988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350×1168 1/32 印张：16.5 插页：2

字数：414000 印数：1—4300

ISBN7-217-00358-x

F·31 定价：4.56元

新书目：88—45



王 琢 近影

访富有创造精神的经济学家——王琢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王琢，1921年11月出生于江苏省阜宁县，幼年迁居上海。1940年参加革命，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曾受聘为北京大学经济系兼职教授，现在的学术职称是研究员。他现任中共广东省委政策研究室研究员，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兼职教授，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生部特聘教授。王琢长期在财经部门从事实际工作，一边实践，一边从事经济学的研究。他是一位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富有创造精神的中国经济学家。

40多年来，王琢研究经济科学的硕果累累。有近200万字的经济学论文。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过渡时期的国家税收》、《苏联税制研究》、《流动资金简论》、《社会再生产规律与流动资金运动》、《国力论》、《经济制约论》、《中国式经济体制研究》、《企业经营学新探》、《体制改革70题》、《宏观经济调节论》。《中国经济模式论》和《王琢选集》也即将出版。最近，我们在广州特地作了一次专访。

王琢在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上有许多重要见解。首先，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问题，他认为，我国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要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份。在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中，必须坚持全民所有制居于主导力量的地位。全民所有制的具体形式是国有制。我国的国有企业同国外企业的合资经营或合作经营，它的性质属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他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

改革，是改革计划产品经济的国有企业体制模式，创立计划商品经济的国有企业体制模式，而绝不是否定国有制。改革国有制形式，实行国有制的两种分级所有。现存的国有制分中央所有和地方各级所有。它反映着各级政府之间的资产所有权的关系。现在要增加国有制的另一种分级所有，是指政府投资形成的资产为政府所有，国有企业投资形成的资产为国有企业所有。这种国有制的分级所有，反映的是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资产所有权的关系。实行第二种国有制的分级所有，政府投资与企业投资分别形成国有制的一级所有和二级所有。由国有制的两级所有者按投资比例分享盈利或分担亏损。这种多元的人格化的利益制约机制，打破了“大锅饭”这个老大难的问题。它从国有制形式上回答了“自负盈亏”是由谁负盈亏的问题。他还认为，在坚持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国有制为主导力量的基础上，积极发展社会主义股份制企业。这样，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以国有制为主导力量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就能渗透到企业内部。实行国有制的分级所有加上股份制，包括企业职工个人和社会上个人投资参股，企业的盈利，按股分红；企业的亏损，按股负亏。这就从所有制形式的改革上，形成了多元的人格化的所有者结构，冲破“一家（国家）所有”形成的“大锅饭”的格局。社会主义股份制企业要求实行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把企业承包给企业家经营。发展社会主义股份经济，将为培养和造就一代社会主义企业家提供园地。

王琢既是我国最先倡导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经济学家之一，又是我国最早撰文反对生产资料低价论的经济学家。早在1956年王琢就撰文论证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是商品，价值规律不仅对流通领域起调节作用，而且对生产领域也起调节作用。他不同意斯大林以所有权为根据的商品的定义，提出以社会

主义全民所有制的生产关系的表现形式为根据，论证国有企业之间是“亲兄弟、明算账”的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关系。

王琢同志对我们谈这第二个问题时说：论证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内部商品经济存在的根据，必须从所有制的分析深入到全民所有制内部生产关系结构的分析。我国现阶段生产力状况决定了全民所有制内部生产关系结构存在着两个层次的联合劳动与两级所有的统一结构：一个层次是企业范围内的联合劳动，同时企业又是一级所有者，所以国有企业之间是各自独立的所有者的联合劳动，因而成为按照社会主义的等价交换原则相互交换活动的商品生产者与经营者；另一个层次是由企业范围联合劳动组成的社会范围的联合劳动，以国有制的一级所有（即各级政府所有）为依托，国有企业作为国有制的二级所有对国有制的一级所有的关系来说，国有企业又是相对独立的经营实体。他认为，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条件下，以经济的增长和技术的进步为基础，创造更多的社会剩余价值，这是国有企业的首要经济任务。在宏观调节下的市场机制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它是一种开放的、竞争的、网络式的市场机制模式。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运行的宏观调节机制以价值机制为特征，以价值总量平衡为基础，并以价值总量平衡来制约和组织实物平衡。宏观调节机制作用于市场，主要是调节市场需求的总量和结构，以实现自觉调节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运行目的。

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是王琢研究的第三个问题。他指出：社会主义必须坚持计划经济制度。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是社会经济调节制度。市场经济是指国民经济的宏观总量平衡和基本比例关系在总体上是以市场调节为主的，计划经济则是自觉的社会调节，即宏观调节。所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就是宏观调节的商品经济，即自觉运用各种调节形式调节经济关系和经济运行，

包括自觉调节宏观总量平衡和基本比例关系。社会主义社会能够在宏观范围实行全面自觉的社会调节，这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优越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重要标志之一。王琢认为，要分清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共产主义计划经济这两种不同社会模式的计划经济的区别：前者是商品生产的计划经济，后者是产品生产的计划经济。他还认为，“短缺经济”绝不是计划经济的必然产物，只是某种错误理论模式的产物。实行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计划经济模式，必须创立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运行需要的新的宏观调节体系。这就要从理论上澄清斯大林关于社会购买力的增长总是超过生产增长这个失误的理论概括，同时要相应改革僵化经济体制模式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王琢强调，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重点必须放在宏观经济层次。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必须实行宏观调节。要坚持商品生产的计划经济的宏观调节理论，承认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存在两个层次——宏观经济层次与微观经济层次，坚持宏观经济调节、微观经济放活的原则。国家对宏观经济的管理必须坚持直接控制为主。当然，直接控制不是指标化一套，必须充分发挥宏观调节机制的作用，自觉调节市场供需的平衡。这是自觉保持国民经济稳定平衡的一个重要标志。

接着，王琢高兴地对我们谈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问题。他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把计划产品经济模式及其体制，改革为计划商品经济模式及其体制。社会主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础。计划商品经济理论，就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商品经济与计划经济的有机结合理论。在商品经济同计划经济的关系上，我不赞成把两者对立起来的观点：一种是只能实行计划产品经济模式的论点；另一种是只能实行“那种完全由市场调节的市场经济”的论点。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王琢认为目前已开始进入第二阶段。这阶段要解决的主

要矛盾是把企业的行政机制改革为企业的经营机制，目的是为了从根本上打破“大锅饭”，使企业成为对市场调节和政府的宏观调节具有灵敏反应的一个活的有机体。他认为，深化企业改革，既要改革国有制形式，实行国有制的两种分级所有和实行社会主义股份经济；又要相应实行“三个分开”的理论对策：一、实行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与资产管理职能分开；二、实行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三实行政府的税收与所有者的利润分开。王琢强调，实现新旧经济体制模式的更替，必须坚持以宏观调节体系为中心的配套改革。实现计划产品经济的宏观调节体系到计划商品经济的宏观调节体系的转变，是形成比较完备的市场体系和市场调节机制的前提条件。只有建立计划商品经济的宏观调节体系，才能够有效制约宏观决策失误，调节宏观总量平衡。这是新体制模式优于旧体制模式的主要标志。他还深刻地跟我们分析了建立新的宏观调节体系的主要内容：在宏观调节层次上，实行分层次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在宏观调节对象上，实行以商品价值平衡为主的办法；在宏观调节重点上，要以堵死产生国民收入政府超额分配的口子为重点；在宏观调节“笼子”上，实行以变量的动态平衡为基础的收支、增减挂钩浮动调节的活“笼子”；在宏观调节机制上，要形成多层次的自我约束需求机制。

时间过得真快，而谈兴越来越浓，王琢最后给我们谈了他的社会主义国民收入分配理论和对特区经济发展的看法。他认为堵住国民收入分配中政府超额分配的口子，是控制宏观总量平衡的治本办法。市场稳不稳，物价稳不稳，经济稳不稳，从一个年度来说，决定于国民收入分配的平衡与否。控制通货膨胀和信用膨胀，必须从经济全局出发，采取治本的办法，这就是堵住国民收入政府超额分配的口子。王琢坚决反对“财政赤字无害论”。他主张坚持财政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原则，坚持在国民收入分配

上组织好财政收支和信贷收支统一平衡的原则。为了使国家预算在执行中不致发生赤字，有必要在宪法上规定，非经人大常委会专案审查批准，不得搞财政性货币发行。王琢说，社会主义国民收入分配有两个基本分配规律：第一是按需分配规律，即全部国民收入的分配，以及国民收入在社会集团之间的分配，是根据可能按照需要分配的规律进行分配的；第二是按劳分配规律，即用于满足个人消费的那部分国民收入在劳动者之间的分配，是遵循按劳分配规律进行分配的。他认为，按劳分配规律也有两种：一种是产品经济的按劳分配规律，一种是商品经济的按劳分配规律。我国原有企业职工的八级工资制，是以产品经济的按劳分配规律为基础的。改革旧的工资制度的理论是商品经济的按劳分配的理论。它的主要特征是以商品经济的按劳分配规律为依据，即通过市场实现等量劳动交换原则，承认社会范围和企业范围两个层次的按劳分配；实行企业工资总额同企业经济效益挂钩浮动的宏观调节体制。至于个人所得的股息和分红，不属按劳分配，也不是剥削关系，而是以社会主义按劳分配为主体的条件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种非劳动收入。

关于经济特区的发展问题，目前有许多争议。王琢认为：经济特区应当以“两张扇面，一个枢纽”作为目标模式。一张扇面对外辐射，一张扇面对内辐射，经济特区就是这“两张扇面”的枢纽。一张扇面对外，要做好进与出两篇文章，我们的战略重点必须做好“大进大出”的文章，大进的重点放在引进外资，引进技术设备，引进管理经验上面；在不断壮大特区的经济技术实力的同时，要相应做好“大出”的文章，积极发展出口创汇产业，力争外汇平衡。王琢主张：在一张扇面对外方面，在经济技术上实行全方位开放的特区模式，更好发挥“四个窗口”的特区功能。王琢同志在谈到从“一国两制”到“一制两体”的问题时

说，“一制”是指“一国两制”中的主体——社会主义制度；“两体”，是指在一种社会主义制度下，对外开放的体制要有两种体制模式，即开放的体制模式和完全开放的体制模式。王琢教授认为，自求外汇平衡是经济特区的一个基本战略对策。这是特区筛选引进项目和调节引进外资进度的一个指导原则。在国家对特区实行一定的外汇优惠政策的条件下，特区应当实行自求外汇平衡原则，包括近期和远期的外汇平衡。他还指出，经济特区要创立商品经济的宏观调节机制，完善商品经济运行的市场机制和企业机制，进一步解决商品经济运行的市场机制同商品经济的宏观调节机制的有机结合问题。他认为，建立新的商品经济的宏观调节机制的主要内容是：国家对深圳经济特区实行变量调节、浮动平衡为主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深圳经济特区要建立一级宏观经济管理体制，并根据新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需要，相应改革政府经济管理机构和转变职能。完善商品经济运行的市场机制和企业机制的主要内容是：健全特区的市场体系，建立对宏观间接调节具有灵敏反映的企业体制，发展同特区“两张扇面”内外辐射的开放型经济特区模式相适应的多种企业模式，包括集团企业和跨国公司。

这次访问，使我们比较系统地了解王琢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学术观点。同时，也体会到，王琢是一位在学术理论上具有开拓精神的勤奋的探索者。我们衷心祝愿他在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的探索中取得更大的成果。

（原载《学术研究》1987年第7期，略有删节）

前 言

1978年以来，一个伟大的时代课题吸引着我。这就是中国经济改革。所以，改革成为我学习、研究和实践的中心课题。在此期间，我在反复思索这样一个问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前人完成了什么历史使命，今人肩负着什么历史使命。前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创造了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决定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和这些阶级之间的斗争”。^①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此为思想武器，完成了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的历史使命。前人——列宁和毛泽东，他们开辟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在两个东方大国完成了把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的历史使命。马、恩、列、毛及其同时代的领导人，都是历史上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今人——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肩负着的历史使命，就是要把社会主义制度潜在的优越性变为现实的优越性。中国的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已经探明实现这个转变的正确道路——改革、开放之路。但是，要完成这个历史使命，还有一系列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等待我们继续探索。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肩负的光荣任务！

从1980年到现在，我一直从事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工作和理论研究工作。回顾这八年改革，我们得出一条经验：改革的是非

^①恩格斯：《反杜林论》第357页，1962年10月新1版。

曲直，只有实践才是检验判断的唯一标准。经过实践的检验，凡是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东西，不管来自洋的还是来自土的理论观念和条条框框，都得冲破；经过实践的检验，凡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得承认。改革不能从“本本”出发，搬外来“模式”，只能从中国国情出发，研究中国经济模式和中国体制模式。这种研究只能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实际出发。社会主义不能丢掉，中国特色也不能丢掉。根据我的研究，中国经济模式的基本特征是：在公有制基础上实现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统一；也可以简称为宏观调节的商品经济；中国经济体制模式的基本特征是：在公有制基础上，实现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与宏观调节机制的统一，也可以简称为宏观调节市场与市场调节企业的统一。中国经济模式与中国经济体制模式的理论基础是社会主义计划商品经济论。这本《中国经济模式论》，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为主线，探索研究了以下十二个问题：

一、在坚持国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研究了社会主义社会多种所有制的合理配置问题，探索了怎样把国有制单元的大、空、纯的所有者结构改革为多元的、人格化的所有者结构的问题，提出社会主义的股分经济和承包经济问题；主张试行“一企多制、合股经营”和推行“三个分开”的配套改革措施：即政府权与企业权分开，包括政府的社会管理权和资产管理权在管理机构上的分开，企业的所有者的权与经营者的权分开，政府的税收与所有者的利润分开，旨在变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在企业的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推行经营承包制和委托经营制。

二、商品经济属于社会生产形式范畴，计划经济属于经济调节制度范畴；社会生产形式与经济调节制度是两种不同序列的经济范畴。按社会历史发展顺序而更替的社会生产形式是：自给生产、商品生产、产品生产；按社会历史发展顺序而更替的经济调

节制度是：自然经济、市场经济、计划经济。

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生产关系基础是全民所有制内部的生产关系结构——国有企业或国有制控股企业具有二重经济关系：一重经济关系是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各个国有企业都是自主经营、自争盈利、自负亏损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这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生产关系基础；又一重经济关系，是国有企业或国有制控股企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企业是相对独立的经营实体，这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生产关系基础。国有企业或国有制控股企业的这种二重经济关系的统一，是中国经济模式——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有机统一的生产关系的客观基础。

四、社会主义国民收入分配，存在两个分配规律：一个是有限按需分配规律，这是制约国民收入分配全局的分配规律；另一个是按劳分配规律，这是制约劳动者个人之间分配的分配规律。按劳分配规律，有产品经济的按劳分配规律，有商品经济的按劳分配规律。工资制度的改革，首先要弄清楚这两种不同的按劳分配规律。

五、在社会主义阶段，不能以排斥市场的直接产品分配取代商品交换。旧体制以排斥市场为基础，以产品的纵向调拨分配取代商品的横向流通，抑制了企业的活力，因此非改不可。政府需要掌握的某些特需商品，可用政府同企业签订合同订货的办法，没有必要保留实物指标的指令性计划。

六、新旧两种经济模式的不同理论基础是：旧的经济模式的理论基础是计划经济与产品生产的有机统一，不是计划经济与自给生产的有机统一；新的经济模式的理论基础是计划经济与商品生产的有机统一，不是市场经济与商品生产的有机统一。

七、当代有两种社会性质的商品经济：一种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另一种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商

品经济。否定或者模糊这两种商品经济社会性质的区别，就会把改革引入歧途。

八、有两种社会模式的计划经济；一种是产品生产的计划经济模式，它是共产主义社会的计划经济模式。这种计划经济模式在社会主义阶段的出现是一种“早产”，必然带有空想因素，所以它缺乏生机和活力，成为僵化的计划经济模式；另一种是商品生产的计划经济模式，它是社会主义阶段的计划经济模式。这种计划经济模式必将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诞生。

九、中国经济体制模式由两个基本部分组成：一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二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运行的宏观调节机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与宏观调节机制的统一，这就是以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相统一为特征的中国经济体制模式。

十、我国“六五”期间形成的新旧两种体制的并存和矛盾，是改革中的一种过渡现象。所谓新旧两种体制的矛盾，主要是新体制形成的商品经济运行机制同旧体制的宏观调节机制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出路在于正确选择改革的战略。我主张实行“突破两头、带动市场”的改革战略。“突破两头”是指突破微观层次的改革和宏观层次的改革。微观层次改革的重点是在国有企业自负盈亏基础上形成企业经营机制。宏观层次改革的重点，是坚持以宏观调节机制为中心的配套改革。“带动市场”是指市场层次的改革，一旦形成新的宏观调节模式和宏观调节机制必能“带动市场”层次的改革。市场层次改革的重点是改革价格体系和价格管理体制，形成健全的市场体系和合理的市场机制。我主张实行全国同步推进与区域推进相结合的改革战略。所谓区域推进的改革战略，就是在国家统一的改革规划指导下，按省（区）、市（包括开放城市和经济特区）为单位，根据己经济发展的需要和政府、企业、居民的承受能力，筹划和推进改革。为此，要

求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政府之间，实行以分级承包为基础的分层次宏观管理。这就是要改对象、换“笼子”、变机制，重点是换“笼子”和变机制。“换笼子”是指把定量控制的死“笼子”改为以承包为基础的变量调节的活“笼子”；“变机制”是指把宏观经济的各个层次，即把各级政府共吃国家“大锅饭”而形成的自我扩张需求机制，改为宏观经济各个层次，即各级政府实行分级承包的“分灶吃饭”宏观管理体制。这种体制必定形成各级政府既具有自我发展机制，又具有自我约束需求机制。这是治“需求膨胀、短缺经济”痼疾的一剂灵丹妙药。

十一、新体制形成的商品经济运行机制已同旧的机构模式及其管理职能相矛盾；但是，旧体制又同新的机构模式及其管理职能相矛盾。正确处理这两个矛盾的办法，需要采取一些保护措施，先在中等城市实行机构改革和转变管理职能的试点，探索机构改革和管理职能转变的路子，然后伴随体制改革的进展，主要是市场机制的形成，再全面推行政府机构的改革。

十二、我国经济特区、是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产物；同时，又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率先把社会主义制度潜在的优越性发挥出来。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高度研究我国经济特区模式，不能搬用国外出口加工区的模式。我在1982年撰文提出，要从特区为全国现代化建设服务和全国支持特区这个战略高度，来探索我国经济特区的新模式。我赞成“两张扇面、一个枢纽”的特区模式。这种特区模式，有利于发挥特区的“四个窗口”的功能，有利于特区多出口、多创汇。只有提高利用外资的能力，发展从国际市场引进的经济活动，才能增强出口创汇的能力，发展向国际市场输出的经济活动，实现外汇的积极平衡，组织特区经济高效益的良性循环。所以，外向与内向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不是相互排斥的关系。当然，不同地区、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重点。

·这本集子收入近作40篇，附录50年代有关论文一篇。目前，中国改革的实践在发展，实践是检验改革理论的唯一标准。所以人们的认识必将随着实践的发展而逐步深化。编辑出版这本集子的目的，只是为了通报我探索研究的进程，希望得到读者的帮助和指正。

作 者

1987年秋